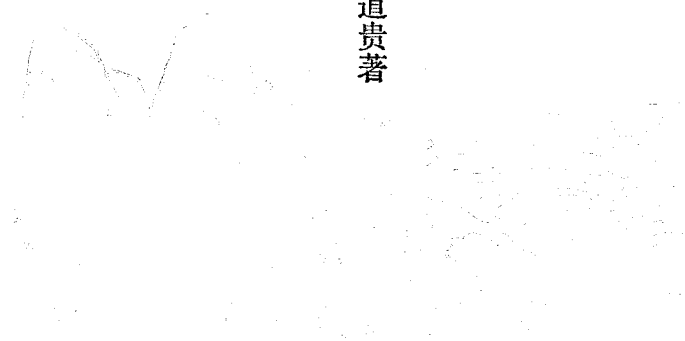


薛福成

丁凤麟 张道贵著



薛福成

丁凤麟 张道贵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通韬沅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12 插页 2 字数 50,000
1983 年 6 月第 1 版 198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500 册

书号: 11100·106 定价: 0.34 元

责任编辑 王士君



薛福成像

目 录

一、发愤读书.....	1
二、栖身曾幕.....	9
三、名满都下.....	18
四、转投北洋.....	23
五、倡导变法.....	32
六、筹防浙东.....	41
七、入京陛见.....	57
八、出使四国.....	62
九、察其利病.....	68
十、关念侨胞.....	83
十一、维护主权.....	90
十二、病逝行台.....	98

一、发愤读书

大清同治四年(1865年)盛夏的一个深夜，一艘宽敞的官船，停泊在江苏宝应附近的大运河上。四周雨声淅沥，流水潺潺，不时传来阵阵蛙鸣虫叫之声，可官船中舱，仍然灯火通明，寂静异常。奉命由南京率军北上“剿捻”的钦差大臣曾国藩，正在伏案翻阅各地士子应招呈递的“万言书”。翻着，翻着，他双眉紧锁，呵气一个接着一个，神情颇为沮丧。原来，已看过的一厚叠，竟没有一份能引起这位“中堂大人”的注目。他不介意地随手捡起案几上的最后一份，打算草草翻阅一下便上床就寝。岂料，不翻犹可，一翻开这份不寻常的“万言书”，曾国藩的目光，好似针尖碰上磁铁般的，被深深吸引住了。他情不自禁地一口气读了下去……

“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虽其间草野臆度之言不乏，而论当今要务，似不外是。言辞芜拙，字迹粗劣，伏惟恕而察之，不胜惶悚冒昧之至。……”工整的小楷，畅达的文笔，尤其是作者独特的见

地和开阔的视野，映在曾国藩的眼帘，似乎使他服了一帖兴奋剂，顿时驱散了浓重的睡意。他再次剪去案头上的烛煤，把这份引人瞩目的“万言书”摊在案上，再仔细诵读一遍。只觉得，通篇宏议郁发，灏气孤行，朴茂神味，洋溢其间，真可谓古文家无此宏迈，策论家无此精深。曾国藩一阵高兴之后，便对左右说：“吾此行得一学人，他日当有造就！”^① 这个使曾国藩为之倾倒的人物，便是在曾国藩面前自称“门下晚生”的薛福成，也就是日后驰名中外的杰出政论家薛福成。

薛福成，字叔耘，号庸庵，清宣宗道光十八年三月十八日（1838年4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一个并不富裕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薛氏祖祖辈辈虽则嗜书如命，苦读寒窗，然而在科场上却很不走运。薛福成的曾祖薛世琛，终生是个未入庠的老童生。祖父薛锦堂，虽然学识根底并不浅，一生也只考上个秀才，称为“府学生”，仍算布衣。其父薛湘，起初也是个依靠教授蒙童养家活口的一介书生，后来苦读中举，充任官学教谕，使寒素的门庭稍有转机，直到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才侥幸考中恩科进士，被委派到镇江当个府学教授，算是真正踏上了仕途。

^①薛福成：《庸庵文外编》卷三。

同父亲相比，薛福成对母亲的情感更为深厚。母亲顾氏，出身于无锡县西溪乡的一个名门望族，“先世自元明以来居无锡为望族”。顾氏之父曾为国子监生。但顾氏五岁时，父亲不幸亡故，家道中落，孤女寡母，“作苦茹澹，衣食仅自给”^①。顾氏从十八岁嫁到薛家后，扶老赡幼，孝事翁姑，是个知书达理的贤妻良母。由于薛家清寒，丈夫又常常在外橐笔宦游，她只身挑起家务重担，平时不但“佐以女红”，靠十指收入贴补家用，还得负责对六子一女的教养。她对子女的教育，十分认真严谨，每天晚上，总得亲自督促薛福成兄弟们努力阅读功课，“教诫不少倦”。每当寒暑风雨之夕，她常对子女们娓娓不倦地讲述，某人家的孩儿，由于读书用功刻苦，终于“身享令名，荣及父母”；某人家的子孙，由于不爱念书，结果“污贱危辱，濒于死亡”。这类正反两方面的劝诫，虽然只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封建说教，但出诸慈母之口，却深深拨动着薛福成幼稚的心灵，每每使他“耸听汗下，罔敢自逸”^②。于是，他发愤读书，矢志按照父祖辈的老路塑造自己，钻研八股，苦读经书，不至夜半，决不罢休。

但是，严酷的社会现实，又给薛福成的成长道路

①② 薛福成：《庸庵文编》卷三《先妣事略》。

带来新的影响。咸丰元年(1851年),正当少年薛福成埋首于四书五经和八股章句之间,风雷激荡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广西金田村爆发了。起义烈火立即燃遍了大江南北。这时的大清王朝,早已从康乾“盛世”的顶端跌落下来,江河日下,步履维艰;更兼鸦片战争的袭击,使之愈加内外交困,百弊丛生,国内哀鸿遍野,呈现出一派衰败景象。

这风狂雨骤的“乱世”,刺激着当时的有识之士,重新思考祖国的前途;也使十三、四岁的薛福成,开始对“专以八股六韵,徒事空谈,抛弃事实”的科举道路,产生了疑问。他试探着改弦易辙,“慨然欲为经世实学,以备国家一日之用,乃屏弃一切而专力于是”,不按八股致仕的科举旧道向前爬行,开始沿着前辈龚自珍、魏源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方向摸索前进,决心使自己成为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为了实现“经世致用”的抱负,薛福成抛弃那些空洞乏味的时文,不再拘泥于八股章句,悉心致力于“经世实学”,博览群书,总结历代王朝成败兴亡之教训,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旁及陆王“心学”,乃至阴阳卜筮,无不专心研究。在刻苦攻读的过程中,他很注意同弟兄们“风雨一灯”,享受“群聚讲习之乐”^①,

①薛福成:《庸庵文编》卷三《季弟遗集序》。

彼此相互切磋辩难，取长补短。在弟兄六人中间，排行第三的福成和年岁相近的四弟福保，手足情谊，更加深厚，“自髫髻以至成人，读书同塾，应试同时”^①。起初，四弟好攻古文辞，覃思不辍，兴趣极浓。薛福成对此不以为然，曾诘问四弟说：“而今世态变化异常剧烈，士子不论遭遇如何，总该追求对现实有助益的经世实学，以见称于当世。你何必一味钻研文艺这门末技呢？”四弟“外讷而中莹”，平时不善言词，但听到这话，却极为明快地回答说：“不然。文与道是相辅相成的。自古以来那些称名于世、遗泽后代的伟人，不会写文章就难以成功。你看，贾谊、董仲舒、诸葛亮、陆贽，都能写出一手很漂亮的文章，这些大贤所以能斡旋世运，名垂青史，还不就是靠了文章的力量吗？！怎能对它这般轻视呢！”^②此番答问，可谓各有千秋，兄弟俩都受到了启发。从这以后，四弟开始注重对经世实学的钻研，凡薛福成读过的书，无不认真阅览，后随薛福成进入曾国藩幕府，磨炼多年，最终成为丁宝桢的左右手，“为掌笈奏以佐之”^③，以学博行高饮誉当时；薛福成也在古文辞上狠下了一番功夫，练就一手超群的古体散文，不但称名当世，对他日后事业

①薛福成：《庸庵文外编》卷四《祭季弟文》。

②薛福成：《庸庵文编》卷三《季弟遗集序》。

③薛福成：《庸庵文续编》卷下《母季弟怀事状》。

的造就，更有莫大裨益。

当然，人生道路是坎坷不平的。薛福成十七岁那年，大哥薛福辰在顺天乡试中了第二名举人，声名大振，还当上了工部员外郎。大哥的少年得志，又激起薛福成沿科举之路猎取功名的愿望。一八五八年春天，他同四弟一起参加了无锡县的童生考试。虽然考生众多，学额有限，在那一千多名的考生中，只能有三十名中秀才。但他俩以杰出才华被拔取，同补县学生，踏上了科举道路的第一层阶梯。当年夏天，英姿勃勃的新秀才薛福成，陪同大哥赴湖南探望父亲薛湘。不料，在湖南担任县令的薛湘，因在对抗太平军中不遗余力，多年积劳成疾，刚接到擢升浔州知府的命令，便于盛夏七月一命归天。一八六〇年春，薛福成兄弟俩办完父亲丧事及善后事宜返回故乡。此时，又值太平军挥戈东征苏常地区，无锡的薛氏家族受到战火冲击，薛福成家的产业也荡然无存，母亲只得带领家小离乡避乱，辗转苏北。薛福成兄弟有家难归，于是“航海涉江”，几经周折，方在苏北宝应的东乡，找到了离散的亲人，开始了侨居他乡的生活。

侨居宝应的薛福成，心情是复杂的。正如他自己所言：“百感交集”。这是因为，作为官宦子弟，他对农民起义造成的“田庐毁废，亲故凋亡”，对“母老家贫”“转徙异乡”的不幸结局，怀着本能的阶级仇恨，于

是，在痛心疾首之余，曾经积极筹划敌视太平军的“灭贼方略”，准备向朝廷献策；作为一个有抱负的青年学子，目睹当时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再次惨败，更使他怵目惊心，闭门读书之余，不能不考虑，如何弥补外国侵略者为祖国造成的深重灾难。

于是，为了实现“匡时济世”的宏大抱负，薛福成更加刻苦地研读“经世实学”，注意了解民间疾苦，考察社会积弊，构思着拯救祖国的蓝图。如今，鸦片战争虽然已过去了十余年，但对林则徐被革职遣戍新疆一事，尤其是对林则徐耿介不阿的坚强性格和“置祸福荣辱于度外”的爱国主义情操，他深为钦佩；而对软骨头琦善、穆彰阿之类投降卖国的无耻行径，更是义愤填膺，时加痛斥。茶余饭后，薛福成常爱对人讲述这样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

林则徐被革职遣戍新疆后，大学士王文恪（王鼎）深为不平，每次上朝遇到穆彰阿时，就指着穆彰阿的鼻子，骂他是秦桧、严嵩。但是，道光皇帝根本听不进人们对他宠爱的首席军机大臣的纷纷谴责，反而更加器重穆彰阿。为此，耿直的王文恪仿效史鱼尸谏之义，自缢身亡，以自己的死，抗议朝廷的不公正。后来，在王文恪祠庙的上空，经常回荡着发自千百万人们胸臆的正义呼声——“林则徐！”

• 7 •

当然，这只是一个经过讲述者加工渲染的传闻故事，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青年薛福成的强烈爱憎。他多么企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步着林文忠公的后尘，在这“千古未有之奇变”的非常时期，凭借自己的才智和赤诚，为改变祖国贫弱的面貌，施展一番“经世致用”的本领呵！

二、栖身曾幕

薛福成的时代条件和本人资历，虽然同当年的林则徐有着很大区别，但是，道是无情却有情的历史，也为有志者薛福成提供了施展才智的机会。

二十六岁那年，薛福成终于得到机缘，被正式卷入政治旋涡。然而，等待着他的却是充当洋务派的幕僚。前面提到，一八六五年夏天，清军将领僧格林沁被农民起义队伍捻军击毙后，清廷惊恐万状，即刻命令两江总督曾国藩督师北上，主持“剿捻”事宜。曾国藩奉旨北上“剿捻”途中，沿途张榜郡县，招致贤才。座船行至江苏宝应时，曾国藩见到薛福成洋洋万言的《上曾侯相书》，不禁拍案叫绝。旋即派人将薛福成召来晤谈。言谈间，曾国藩目睹这位自称“门下晚生”的青年学子举止端庄，谈吐不凡，不但晓于国家大事，且国学根底深厚，是个难得的“经世”之才，当场要薛福成留下，充当他的幕僚，颇有点相见恨晚的味道。当晚，曾国藩在日记中郑重记下：“故友薛晓帆之子福成，递条陈约万余言，阅毕，嘉赏无已。”^①

^①薛福成：《庸庵文外编》卷三。

薛福成生平第一次见到这样一位权势显赫的达官权贵，且又对自己如此器重，便满口答应，从此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曾国藩幕下客的生涯。

这样，曾国藩的戎幕中，又增添了一名参与机要的随员。薛福成同比他早进曾幕的向师棣、黎庶昌等人一起，共同辅佐并筹划曾国藩镇压农民运动。在此期间，薛福成追随曾国藩北驻徐州、移师济宁、奔赴河南，在“剿捻”过程中，登泰山、跨黄河，饱览了祖国大好河山，更了解到中原地区的政俗民情；曾国藩因“剿捻”无能，被清廷罢斥回到两江总督本任后，薛福成又跟随南返，栖居南京两江总督衙门。同治六年（1867年），忽逢秋闱大比。薛福成这位“进学”已近十年的秀才，虽曾痛斥过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但他毕竟是封建士大夫群中的一员，不愿放弃这一中举机会。可是，经过“乡试”，薛福成只中了一名不能进京参加会试的“副贡生”。这次科场失意，彻底打消了薛福成沿着科举“正途”向上高升的幻想。此后，他便戴着“副贡生”这顶最高功名，决心沿着充当幕僚这条“他途”，向前闯荡，曲折地实现经世致用的抱负。

随着岁月的流逝，薛福成同曾国藩的师承关系愈来愈深，几乎朝夕相从。曾国藩酷爱下围棋，每日清晨，都要请嗜好相同的薛福成与之对弈。不但切磋棋艺，更注重交流对诸如“兵事、饷事、吏事、文事”等

项军国大计的种种设想。

一日清晨，曾国藩、薛福成吃罢早点，照例又在庭园里摆开阵势，下起围棋来了。刚开局不久，曾国藩就向薛福成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大清王朝总是遭致泰西各国之侵侮？”素来镇静的薛福成，慢悠悠地提起茶杯，呷了一口浓茶，沉思片刻，答道：“大帅！西人初次与我大清王朝打交道时，尚未摸清我们的实际情况，往往被我们‘夜郎自大’的神态所吓倒，故不敢轻举妄动。自从鸦片战争之后，西人看清楚了我们大清的种种举措，忽而罢兵弛禁，且偿其货以骄之，继而倏战倏和，茫无成议，以致战则丧师，和则辱国，于是中国之实情，历历在西人之目；这样一来，西人得寸进尺，贪得无厌，向我索地索币之师，纷然狎至，胃口变得越来越大了。这就是我大清王朝总是遭受邻国不断侵侮之原因。”薛福成抓住清王朝的昏聩腐朽和虚骄，来剖析中国遭受列强欺凌的原因，还是击中时弊的。惯以忠于大清王朝自诩的曾国藩，听到这些不满于朝廷现状的直言，颇有点坐立不安，但对僚属当面向自己陈述其肺腑之言，也不无称许之意。于是，他在用汗巾抹去冷汗后，外表上强作镇静，对着薛福成连连点头，并再追问一句：

“那么，依子之见，该怎么办呢？”

听到这么一问，薛福成神态显得激动起来，索性

离开座椅，向曾国藩陈述了自己几年来“渊渊夜思”的救国大计。

“大帅！尔今面临的是中华千古以来未有之奇变。我大清王朝切不可等闲坐视，再不能夜郎自大，闭关自守了。应该学习西方，夺其所长，避其所短，不能一谈到洋枪、洋炮、火车、轮船，就谈虎色变，瞠目束手，拒之千里之外，甘愿受强敌之侵侮。为今之计，应该引进洋人的先进技术，力求自强，决不能再抱残守缺，一味死捧着经书了！”

薛福成这番议论，是有强烈感染力的。虽然不可能唤醒这位位至“上相”的清廷大僚去实心“照办”，付诸实施。但平心而论，薛福成所阐发的比当年林则徐、魏源等人更为具体的学习西方长技的意见，对正在热衷于倡导“洋务”的曾国藩，还是起着一定的影响，至少促进这位炙手可热的达官权贵抬起头来去看看西方，对洋人再采取“以扇遮面”的老一套办法，是无论如何也行不通了。当然，在洋务运动中，曾国藩等人站在“力保和局”的立场上，对侵略者处处忍辱退让，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制民”，这与薛福成提倡的向西方学习的初衷有着原则的区别。薛福成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继承林则徐等先驱的爱国立场，较有系统地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正确主张，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进步。

在曾国藩的戎幕中，薛福成一方面勤于职守，积极就改革时弊提出对策，另一方面同曾国藩左右的文武官吏广泛交往，搜集并整理了前朝和本朝的遗闻轶事，为后代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史料。一八六九年夏初，薛福成北上保定，途经山东济南，由于四弟福保正在山东巡抚丁宝桢幕下供职，薛福成顺道探望四弟，乘便拜谒了丁宝桢。彼此相谈十分知己。在临别之际，丁宝桢愤慨地谈起慈禧太后宠信的太监安得海如何怙权作恶扰乱朝政的状况，并悄悄地询问：“听说安得海即将前往广东，看来一定要经过山东，若抓住他的把柄来个先斩后奏，能行吗？”薛福成与其弟早就对独揽大权的慈禧太后有所不满，对阉竖安得海之流的为虎作伥更加深恶痛绝，如今听到丁宝桢的除奸打算，颇中下怀，便抓住时机，进一步鼓动丁宝桢一定乘时除掉安得海，建此“不世之业”。薛福成弟兄也估计到这一举措十分棘手，又为之积极献策，建议丁宝桢必须既秘密又果断地行事，免得反遭祸害而貽患天下。当年秋天，安得海果然由水路飞扬跋扈地离京南下，声势赫赫地途经山东。丁宝桢闻讯，一面抓住太监不能单独出京的清朝“祖宗家法”为把柄，连夜上疏朝廷，指斥安得海“矫旨出都”，“僭擬无度”；一面檄令部下紧追安得海，在泰安境内将他擒获。但权阉安得海利令智昏，倚仗奉慈禧赴广东